

语 言 学 前 沿 丛 书

第二种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

——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

石毓智 李 讷 著

A History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Chinese

— Motivations and Mechanisms of Evolution of Chinese Morpho-syntax

Shi Yuzhi Charles N. Li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
——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

石毓智 李讷 著

A History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Chinese
——Motivations and Mechanisms of Evolution of Chinese Morpho-syntax

Shi Yuzhi Charles N. Li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石毓智,李讷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11

ISBN 7-301-05243-X

I. 汉… II. ①石… ②李… III. 语法-汉语史 IV. 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6507 号

书 名: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

著作责任者: 石毓智 李讷 (Charles N. Li)

责任编辑: 徐 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243-X/H·0673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8 邮购部 62752019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62549189)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3.875 印张 392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石毓智，1963年生，河南省洛阳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师从Elizabeth C. Traugott 和Paul Kiparsky学习历史语言学。在1995—1999年期间参加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汉语历史形态句法学”研究项目。主要研究兴趣为汉语语法、认知功能语言学、语法化理论、文学与语言之关系。已有多本专著和数十篇论文发表。



李讷 (Charles N. Li), 1941年生, 山东人。美国加州伯克莱分校博士。现为加州圣芭芭拉分校语言学教授, 兼任该校研究生院院长, 2001年美国暑期语言学院校长。于1997-1998年期间担任荷兰皇家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功能语言学、语法化理论、汉语语法等, 已在Language, Language Sciences, 《中国语文》、《语言研究》等国内外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他编著的Mandarin Chinese, Subject and Topic, Word Order and Word Order Change, Mechanisms of Syntactic Change等专著, 在国际和国内语言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和出版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BR-9818629) 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基金 (Staff Research Project, R-102-000-016-112) 的资助, 特此致谢!

题 记

纵观汉语几千年的发展史,就如同一部交响乐。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高潮,也有相对平静的时期。任何具体的变化都要符合一个主旋律。语法发展史不是孤立现象的产生和消亡的堆积,而是成系统的发展变化。语言规律的和谐与完美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序

大约十五年前,我和徐昌华先生合作,翻译了日本太田辰夫先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这本书的英文名是“A Historical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是追溯现代汉语语法的发展历史的。这本书用翔实材料描写出现代汉语的语法是如何发展而来的,作者深厚的功力和严谨的学风令我叹服。尽管书中某些地方说得不够准确或有疏漏,但一些主要内容和材料人们至今还在引用。而且,不要忘记,这本书是1958年出版的,在那时,研究近代汉语的人还很少,这本书可以说是太田先生主要凭自己的积累和研究而写成的,这需要多么深厚的学养,需要付出多大的精力!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今天,汉语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就汉语史的研究而言,可以说是从以描写为主发展到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解释。

什么叫“解释”?照我的理解,“解释”包括以下几方面:(1)寻找各种语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语言是一个系统,某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受本系统内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有时还会受语言接触的影响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汉语史研究的任务,不仅要正确地描写出各种现象何时产生,如何发展,而且要说明它为何在此时产生,为何朝这种方向发展,也就是说,要找出这种影响。(2)揭示语言发展的机制。各种不同的语言现象是在不同的时间产生,又沿着不同的途径发展的,影响它们的因素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时代悬隔的语言现象,其产生和发展的途径却非常相似。比如“将”、“把”、“捉”先后发展为处置式的标志,“被”和“吃”先后发展为被动句的标志,都是很好的例子。为什么产生于不同时代的语法演变会采取同一路径呢?这告诉我们,在一些语法演变背后,可能有共同的演变机制在起作用。这也是汉语史的研究需要努力揭示的。(3)探求语言发展的规律。任何科学的目标都是要探求

规律,语言学也不例外。就汉语史的研究来说,首先要探求汉语本身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还应该把眼光放开一点,拿汉语的历史发展和世界上其他语言来进行比较,如果能找到共同的东西,就能找到更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比方说,汉藏语系共同的规律,或者人类语言共同的规律)。

不言而喻,解释必须是在正确的描写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对语言事实还没有弄清楚,或者对语言事实的把握不准确,那么,解释就无从谈起;如果基础不牢靠,那么,在此基础上的“解释”只能是空中楼阁,再漂亮也没有实际价值。

但是,只重视描写,不重视在描写基础上的解释,也是不对的。我并不反对有一些研究者侧重于描写,他们所做的发掘、考释、整理、汇集等基础性工作对汉语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一些学者在做这些基础性工作时,也对这些材料作了不同程度的解释。但就整个汉语研究来说,如果认为光是描写就已足够,而不重视理论思考,不重视解释,那么,我们的汉语研究就永远无法提高水平。

近年来,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学者对描写基础上的解释越来越重视了,出现了不少好文章。但要说系统的专著,石毓智、李讷的《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以下简称“石著”)应该说是第一部。

这部书和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样,是追溯现代汉语语法的发展历史的。但太田的书重在描写,石著重在解释,这一点,从石著的书名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部书涉及的面非常广。从时代看,对现代汉语中判断词“是”的来源的追踪一直上溯到先秦,对现代汉语中“有没有+VP”的来源的探讨则只涉及二十世纪上半叶,其时间跨度上下达三千年。从问题看,现代汉语中重要的语法现象,诸如动补结构,体标记(了、着、过),把字句,被动句,比较句,动词重叠,动词拷贝,否定标志系统,量词系统,结构助词“的”、复数标志“们”等等,都追溯了历史来源,探讨了发展的动因和机制。

我很有兴趣地读了这部书,觉得这部书有两大优点:(1)把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汉语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很值得提倡的。过去,

在汉语研究中“古”、“今”的界线分得太清楚,这无论是对现代汉语的研究还是对汉语史的研究都是不利的。这个问题我谈过多次,这里不拟多谈。(2)对汉语语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作了深入的探讨,这是对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很大的推动。这里主要谈这个问题。

一位学者要对汉语发展的历史进行解释,应当具备三方面的素质:良好的理论素养,敏锐的观察力,对汉语发展史的熟悉和从汉语历史事实出发的态度。前两方面的素质,这部书的主要作者石毓智博士无疑是具备的。他曾师从美国几位著名的历史语言学家,对西方的语言理论相当熟悉,这从他书中所引述和运用的一些理论可以看出。当他把这些理论用于汉语历史发展的研究时,他的目光是敏锐的,能抓住汉语语法中一些人们习焉不察的东西。至于第三方面,石毓智博士本来是研究现代汉语的,但转向历史语言学后,在汉语史方面下了不少工夫;而且,从总体上说,他并没有把西方的理论拿来生搬硬套,而是比较注意从汉语的实际出发。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和李讷先生合写的书是有价值的,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性的见解。

比如,书中说到:“语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结构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反映在历史上就是,语法的发展是成系统的,它不是一个个孤立现象的产生和消失,而是每一种现象的出现都有其特有的历史动因。”这一观点贯穿于全书,由此出发,作者把动补结构的产生和汉语史上形态、构词法和句法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虽然有些结论尚可商榷,但总体思路是对的。

又如,书中说“语法化理论认为(Hopper & Traugott 1993),语义相宜性和句法环境是诱发一个词汇语法化的两个必要条件。”作者在运用这一理论的同时,又采用了 Kiparsky 关于“类推”的解释,成功地说明了“是”从指示代词到判断词的演变。在其他问题的分析中,作者也很重视对引发词汇语法化的句法环境的分析,这也是本书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又如,书中对比较句的历史演变作了研究。作者从“结构和功能互相作用来推动一个语言句法体系发展”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因而比原先的研究进了一步。在该章的“结语”中说:“语言交际总要求一种结构具有明确的表达功能。某种结构消失了,可是它原有的交际功

能往往不会随之而去,而要寻求各个方面与原结构接近的格式来表示。这个格式的原功能和新转来的功能会发生矛盾,语言就采用改造或分化该格式的办法来达到表义明确的目的。结果就导致了句法结构的一系列变化。”这一概括对于语法史的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

本书也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下面也举几个例子。

如:关于动补结构的产生。本书认为,在上古汉语的“多动共宾”格式“V1+V2+O”中,两个V都必须是及物动词,都与宾语具有行为-受事关系。后来的动补结构与此不同,“V+C+O”中,C多数是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和宾语不构成行为-受事关系。那么,C是怎样进入V和O之间的位置的呢?本书认为,该类动补结构语法化的句法环境是VC(C是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后面不带宾语),VC经常连用,凝成一个类似单独动词的单位,结果后面可以带宾语。书中举“V却”为例,说“却”到魏晋南北朝演化出“掉、完”的义项,这个时期的“V+却”之后不能带宾语。只有“却”逐渐虚化为词尾之后,到了唐代,“V+却”才能带宾语。“V+却”之后不能带宾语约四百年之久,这四百年就是“却”语法化的阶段。

按:“说有易,说无难。”曹广顺《试论汉语动态助词的形成过程》(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巴蜀书社,2000)举出《佛本行集经》中“除却沙石”、“掷却箆篲”、“掷却诸杂曼华”及《南齐书》中“以手击却数人”四例,都是“V+却”后面带宾语。最后一例容有歧义,前三例无可怀疑。再者,“V+得(+O)”也是一种重要的动补结构,“V得”后面一直可以带宾语,并不是先有“V得”的凝固,然后才带上宾语。这样,石著所论就与汉语史的事实有出入。

又如,本书在说到动补结构的产生对汉语语法的影响时,认为它“诱发位于连动结构第一动词虚化为介词,表示各种各样的语法范畴”,如表处置的“将”、“把”,表被动的“被”、“叫”等。书中还几次说到动补结构的产生是处置式产生的动因。其理由是:较早的格式是“V+O+C”,动补结构“VC”凝固化后中间不能再插入东西,原来在中间的宾语只能一律放到谓语动词前面去;谓语动词前面的名词性成分复杂化了,因此需要用新的语法标记来区别其语义角色。

按:“V+O+C”的消失和“VC”的凝固是很晚的事情,而处置式

的产生要早得多；而且，早期的处置式或是“处置到”等形式，或是以单个动词作谓语，处置式中以动补结构作谓语是后来的事情，不能颠倒时间顺序，把“V+O+C”的消失和“VC”的凝固作为处置式产生的动因或诱因。至于被动句，包括“为”字句和“被”字句，则出现得更早，要说“V+O+C”消失和“VC”凝固后宾语移到谓语动词前，为了区分其语义角色而加上被动标记“为”和“被”就更难以讲通。这样，石著所论和汉语史的发展顺序有出入。

又如，本书对表复数的“们”的来源提出一个新的看法，认为是从表示“学派”、“家族”的“门”发展来的。

按：对此我有一些怀疑。1. 汉语词汇的语法化，往往是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旧形式和新形式有时往往难以区分。如动词的“把”和表处置的“把”，表“别人”的“他”和表第三人称的“他”，都有这种情况，而这正是新旧两种形式有联系的证明。但表示“学派”、“家族”的“门”和表示复数的“们”分得清清楚楚，说后者由前者发展而来证据不足。2. 汉语中新的语言成分用什么书写形式，有两种情形：一种像“他”，由“别人”义发展为第三人称，因为发展线索很清楚，人们不会改换成另一个写法。另一种像“这”，因为来源不清楚，或人们意识不到其来源，就有“者”“遮”“赭”“这”等多种写法。表复数的“们”也有多种写法：“门”“懣”“每”“们”等。如果它真是由表示“学派”、“家族”的“门”虚化而来的，其发展线索很清楚，写法应不至于如此分歧。（关于“们”的多种写法，石著有一个解释，但理由不很充分。）

此外，书中有一些例句的理解和使用不妥，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以上都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都是举例性的。对于一本书的评判，广大读者是最有权威的。除上述例子以外，书中还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地方，也还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读者都可以自己去评论；而且，各人的看法很可能不同，这在学术问题上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我想，有一点恐怕是大家都会同意的：这部书最大的好处是，引导大家在汉语研究中注重理论思考，引导大家在认真描写的基础上对语言现象和语言演变进行解释，引导大家去探讨汉语发展演变的动因、

机制和规律。书中说得对的地方,固然是把汉语史的研究从理论上提升了一步;尚可商榷的地方,也是对汉语史研究的一个推动:如果这样解释不合适,那么,该怎样解释才行?这就促使人们从理论上去思考。而这种理论思考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促进理论思考,对汉语的研究大有好处,它将在新世纪中给汉语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一书即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我为此感到高兴,并郑重地把它推荐给读者。

蒋绍愚

2001年6月于北大

前 言

本书是我们最近五年来在汉语历史句法形态学领域工作的一个总结。该课题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基金的赞助。其中部分成果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语文》、《语言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语言学论丛》、《国外语言学》、《当代语言学》、《中国语言学论丛》、Language Science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等国内外刊物上相继发表,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这次把它们整理成一本书出版,希望能够系统反映汉语形态句法史的全貌,并向广大读者请教。

我本来是做现代汉语研究的,而且早就立志一辈子做这个,搞汉语史研究完全是我意想不到的一个发展,这一半是因为偶然的巧合,一半是因为命运的安排。当我1995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读书遇到困难、走投无路时,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的李讷教授刚刚申请到一笔科研基金,急需有人来共同开展。我们就一拍即合,这使我绝处逢生。这样才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围绕着6个课题的研究,写出了几篇论文。这使我意识到汉语史的研究别有洞天,并从此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段研究经验和资历,不仅使我顺利拿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而且能够在3年之内顺利完成博士学业。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李讷教授,是他为我创造了对我后来学业甚至学术兴趣具有深远影响的机会。我到斯坦福以后,除了假期返回圣巴巴拉做研究以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继续做历史语法研究。即使今天我在新加坡工作,申请的研究课题仍是与历史的有关。参加李老师的课题深深地改变了我的语言观和研究兴趣,大有一种不联系历史没办法讨论问题的感觉。

我很幸运能有机会到斯坦福大学这个国际知名学府读书,更幸运的是能有机会师从当今的几位历史语言学大师。其中 Paul Kiparsky 和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对我的影响最深。我修读了

Kiparsky 的“历史句法形态学”课和 Traugott 的“语法化理论”课。他们两位背景不同,研究风格形成鲜明对比。Kiparsky 出身于麻省理工学院 (MIT),背景主要是形式语言学派的,他的思路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能从大处着手,把握人类语言发展的主旋律。Traugott 的兴趣主要是功能语言学派的,她的研究风格细腻、严谨,以小见大,注重从具体的语言现象中探求语言发展的规律。如果说, Kiparsky 是历史语言学领域的“豪放派”,那么 Traugott 应该就是“婉约派”了。他们两个的研究特点实际上体现了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语言学派的精神在历史语言学领域的应用。我们认为最理想的是能够把这两种精神结合起来,并一直努力朝这个方向发展。

要研究好汉语语法发展史,应该有一种类型学的视野。简单地说,就是把汉语史的研究放在人类语言发展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这样做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好处。首先,便于发现研究课题。如果两个或者多个语言在某一方面具有共同的发展历程,这很可能不是偶然的巧合,背后必有规律性的东西在制约着。找到这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很有意义的发现。比如世界上几十种语言中表“领有”概念的动词不约而同地发展成了完成体标记,汉语完成体的否定式“没有+VP”和一些南方方言也是如此,其背后蕴藏着深刻的认知规律。其次,可以帮助我们众多可能的解释中确立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比如关于汉语结构助词“底(的)”的来源,起码有三种说法,一是来自于原来的助词“之”或者“者”,二是来自于它的处所词用法,三是来自于它的指代词用法。单从汉语内部来看,一时很难分出高下。但是拿来跟别的语言比较,也许马上就可以知道哪种说法更有道理。助词“的”的重要用法之一是作定语从句的标记,很多语言的定语从句都是从指代词发展出来的,因此我们认为第三种观点比较有说服力。最后,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能做到前两点,我们的研究就会超越单纯资料的收集或者语法现象产生时间的追溯,而进入人类语言发展规律的探讨,所概括出来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其他语言的有关现象。也就是说,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汉语史研究更具有普通语言学的色彩。

进行语法化研究,我们中国学者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语法

化注重探讨一个新语法手段的发展过程,特别重视如何由一个个细微的变化积累而成一个重要的发展。然而一个语法化过程通常是缓慢、渐进的,短则几百年,长则上千年,如果把它所带来的连锁反应算进去,时间就更长了。那么探讨一个语法化的完整过程,不仅需要长期的历史资料积累,而且需要历史资料的连续性,系统纪录每个历史时期的语言面貌。汉语有文献资料的历史之长和连续性之高,没有任何语言可与之比拟。所以在历时语言学领域中,我们理应作出与灿烂的中华文化史相符的成绩来。

纵观汉语几千年的发展史,就如同一首交响乐。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高潮,也有相对平静的时期。任何具体的变化都要符合这个主旋律。语法发展史不是孤立现象的产生和消亡的堆积,而是成系统的发展变化。语言规律的和谐和完美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论从共时的角度看还是从历时的角度看,语法都是一个有机体。因此,语法的发展常常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一个新语法手段的加入往往会引起相关现象的变化,在发展过程中几种相关的语法范畴会互相影响。

语言历史的研究还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研究汉语的专家,都有一种语言优劣观。看到汉语没有别的语言的某种形态或者语法标记,就好像看到中国没有航天飞机或者太空站一样,有一种“愧不如人”的感觉,认为汉语是一种粗疏的、缺乏逻辑的语言。但是从人类语言发展的规律来看,大可不必如此。首先,汉语语法的标记手段是由汉语句子的基本语序 SVO 决定的,凡是采用这种语序的语言,都是充分利用语序表示各种语法范畴,相对而言,形态标记比较简单。相应地,SOV 语言的形态标记比较复杂。其次,语言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是,很多 SOV 语言已经或者正在演化成 SVO,与此同时,它们的形态标记系统则大幅度简化。但是,没有朝相反方向的发展,即没有语言是从 SVO 发展成 SOV 而且形态逐渐丰富的。因此就有语言学家认为,利用 SVO 语序来区别句子的基本成分和利用语序变换表达各种语法范畴,是最优化的语法选择。我们并不一定要说汉语比别的语言优越,但是起码可以消除不必要的自卑。

我们的研究还得益于很多学者。首先,关于复数标记“们”的发展和关于先秦代词语序变换部分分别有南加州大学李艳惠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徐杰博士直接参与。我在圣巴巴拉研究期间曾有一段与张伯江先生“同事”,很多问题都曾与他讨论过,受益很大。我也多次与同乡好友陶红印博士探究有关问题,他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理论思考对我非常有启发。丁邦新教授今年年初曾在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月的访问教授,借此机会我向他请教了书中的很多问题,常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今年年初,曾到北京大学做过一次报告,陆俭明、蒋绍愚、沈家煊、王洪君、崔希亮等先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还要特别感谢的是华中理工大学的汪平和李崇兴老师,不仅在读研究生时期我跟他们系统地学习了有关课程,而且书中的部分章节在以文章形式发表时承蒙他们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使得文章的论证更加严密。

蒋绍愚先生认真审阅了书稿,并在教学和科研极度繁忙之时,为我们写了一篇长达6页的序。蒋先生在序中既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又提出了中肯的批评。特别是他指出了书稿中的一些用例不当之处,这使得我们能够及时加以更正,从而提高了书稿的质量。蒋先生的学术风范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毓林兄对本书的出版有特殊的贡献。他不仅向北京大学出版社大力推荐此书,而且在本书的编订过程中,恰好他在新加坡访问讲学,有机会跟他讨论了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获益良多。

最后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徐刚和郭力先生,是他们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劳动,使得作者才有这个宝贵的与读者交流的机会。

石毓智

2000年12月6日于新加坡国立大学